

茅盾《杂谈苏联》的初刊处

■金传胜

1946年12月初至次年4月初,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之邀,茅盾、孔德沚夫妇在苏联考察游历,从而对该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有了切实的认识。

归国后,茅盾自觉充当了“文艺界的苏联问题专家”,应上海各学校机构与文化团体的约请,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的公开演讲。1948年4月,茅盾在开明书店出版散文集《苏联见闻录》,作为中苏文协文艺丛书之一。该书所收文章是茅盾赴苏后一路所作,写完后续寄国内《时代日报》发表的。他晚年回忆:“这是我在离开上海之前对时代日报和叶以群许下的承诺——将访苏的沿途见闻,用日记和游记的形式随时写下来寄回国内,并且连题目都已确定,叫《苏联见闻录》。”

《苏联见闻录》印行时,根据党组织安排,茅盾已在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此时,茅盾觉得有必要向国内民众与读者全面介绍苏联的情形,遂开始撰写《杂谈苏联》,作为《苏联见闻录》的补充。1949年4月,《杂谈苏联》由上海致用书店推出初版本。对于该书创作缘起与过程,茅盾亦有回忆:

为了迎接新中国,我在四八年上半年除了继续写完《苏联见闻录》,又着手写《杂谈苏联》。我想:蒋介石政权20多年来的反苏联宣传,在一般人的脑海中蒙上了一层对苏联的阴影,总觉得苏联张着一张“铁幕”,其真相不可

得知;即使是进步人士,有的也流露出理解和神秘感……

要全面介绍苏联,我的《苏联见闻录》就不够了。《苏联见闻录》只着重于文化艺术方面的介绍,其他方面,我虽然也零星地记了一点,也带回了一些材料,但距“全面”,相差尚远。幸而我得到一本英文版的1947年《苏维埃年历》,再参考了其他的苏联出版的英文书报,才使我大着胆子,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杂谈苏联》。《杂谈苏联》共分四编58节。分别介绍了苏联政体、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生活。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未在报刊上发表,直接由致用书店在上海出版了单行本。

茅盾研究专家桂松认为:“这里,茅盾所记的是事实。当时《杂谈苏联》的大部分文章是直接结集出版的,但也有小部分是先发表的。”既然旨在向广大读者“全面介绍苏联”,为何不在香港报刊先行发表,反而大半年后才将书稿交付远在上海的书店出版?作为新文学的名作家,以茅盾的文坛影响力,其作品不乏发表渠道。更何况,1948年9月至12月,茅盾还曾主编香港《文汇报·文艺周刊》,何以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不利用呢?

最近,笔者查阅1948年香港《华侨日报》时,发现《杂谈苏联》曾在该报连载,终于解开了这一疑惑。

1948年6月9日、10日,《华侨日报》连续刊发启事,对连载茅盾《杂谈苏联》系列文章作了预告:

本报由本月十一日起,陆续刊载文学家茅盾先生近作《杂谈苏联》一文。茅盾先生去岁应邀赴苏联考察,归国后,曾出版《苏联见闻录》一书,对第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国内一般实情,作翔确之叙述,给予一般研究社会主义的苏联实情者以不少助力。兹篇乃茅盾先生继《苏联见闻录》后,论述苏联之文字,并特别循应本报请求,单独在本报发表。先此预告,敬希爱护本报读者注意,并向茅盾先生致其谢忱。

自6月11日起,该报刊登《杂谈苏联》,首篇是《保健事业(杂谈苏联之一)》,其后依次为《个人营业的医生及医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各取所值”与私有财产》《“房荒”问题的解决》《斯大林格勒的复兴》《RSFSR》《苏联的电影事业》《曾得斯大林奖的名导演》《莫斯科——过去,现在与未来》《莫斯科的大戏院,小戏院和艺术戏院》《乌克兰共和国》(按:均省略副标



题)等,最后为《自由与平等(杂谈苏联之四十九)》。8月24日载毕,其中6月27日、30日和7月5日未登。基本每天一个话题,少数篇

目因较长而分两或三次登完。

确定《杂谈苏联》曾在《华侨日报》刊载,至少有两方面意义。

第一,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人曾在战后的香港努力积极地开拓宣传据点。在中共领导下,左翼文人创办进步报刊、书店、出版社与教育机构等,以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当时香港几家大报政治背景不尽相同,《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喉舌,《华商报》为共产党控制,《光明报》是民盟机关刊物,《文汇报》为民革所办,《大公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不左不右。《华侨日报》以小市民、工商界为主要受众,“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主要以香港的利益为出发点”。1947年编纂的《香港年鉴》数据显示,1946年该报销量达38000份,居全港之首,可见该报在当时的影响力。为争夺宣传阵地,拓展舆论渠道,扩大统一战线,左翼文化界注重对于《华侨日报》等当地媒介的渗透。即使如预告启事所言,是《华侨日报》主动向茅盾约稿,《杂谈苏联》能在《华侨日报》连载达两个多月,仍可视作左翼文人成功渗透的结果。

第二,《华侨日报》所载《杂谈苏联》当是该书初刊版。《杂谈苏联》结集成书时,“共分四编五十八节”,单篇的排列与在报纸上初刊时的顺序已经不同,不少单篇的题目还作了修改。在梳理茅盾著作的版本情况时,这些改动与变化均需注意。

(上接第一版)

1939年10月,从北疆回来不久,杜重远遭盛世才软禁。紧接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秘密逮捕,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形势骤趋紧张。艺术家赵丹等人到迪化后,常有陌生人来打探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在新疆官场,谁与谁联系多了,说话多了,谁到谁那里去了,都会有人打探后向盛世才报告。

张仲实自北疆回来就提心吊胆,他与茅盾十分紧迫地感到:此地不是久留之地!

茅盾后来回忆:当时,“我和张仲实感到形势越来越险恶了。我们和孟一鸣商量如何离开新疆。他要我们慢慢来,据他分析,我们二人名声大,平时言行谨慎,盛世才还不至于对我们下手。要我们等待时机,不宜贸然提出辞职。”

三

1940年元旦后不久,茅盾和张仲实又与孟一鸣商量如何离开新疆。孟一鸣分析,盛世才对雁冰兄没有怀疑,但对仲实兄恐怕有些疑心。他多次问我,仲实是怎么去苏联的,回国多久了,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只好回答他,我不清楚。

张仲实听后,非常紧张又有点激动,欲与盛世才说清楚。孟一鸣劝说,盛世才既已怀疑你,解释也没有用,反而会增加值他的怀疑。估计一时不会对你动手。

茅盾晚年在回忆录曾说到张仲实的危险:

那一段时间,仲实很烦闷,又很寂寞,就常到我家中来坐坐。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仲实在我家闲谈,谈到杜重远最近再次要求回内地治病又遭盛世才借口没有交通工具而拒绝,感到杜的前途十分危险。正谈着,仲实突然接到通知,说盛世才要他马上去督办公署。这是很反常的,因为往常盛世才没有单独召见过仲实,都是

我们两人同去的。而盛世才又常以谈话为名拘捕人犯。仲实敏感地说:恐怕要出事了!我与德沚也感到事态不寻常,德沚甚至急得要哭,但又无能为力,只能握手互嘱“保重”。仲实一去三个钟头,我和德沚就在电话旁枯坐三个小时。直等到暮色降临,仲实终于回来了,一进门,大衣未脱,我们就喜出望外地围上去问究竟。仲实摇摇头说:“唉呀呀,这几个小时就像闯过了鬼门关!”原来仲实到了督办公署,并未见到盛世才,也未引到盛通常会客的西花厅,却被副官带到了一间厢房,说督办请您等一等。这一等就等了两个多小时。“你们可以想见,这两个多小时我是怎样熬过来的!”最后,盛世才终于来了,手中拿着一份材料,说要仲实修改一下,并为仲实的久候表示歉意。说完,他又走了。仲实一看,这是一份极普通的材料,用十几分钟就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请副官送交盛世才。一会儿副官回来说,请张先生回去吧。仲实说,事情很明白,他要我修改材料,完全是借口,因为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份材料让我等两个小时,他可以把材料送到我家。猜想起来,他本想把把我抓起来,所以把我带到了厢房,后来又犹豫了,反复权衡了两个小时,才借口让我修改材料,把我放了。仲实的分析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盛世才为什么要抓他呢?使人难以捉摸。仲实早年在苏联留学,参加过共产党,回国后因故脱党,这些不能作为抓他的理由,除非因为仲实与杜重远的关系比较密切。

当时,新疆官场有“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盛督办请谈话”的说法,“请谈话”是盛世才惯用的捕人手法。所以茅盾和张仲实又急忙找孟一鸣,希望中共党组织能帮助他们离开险境。孟告诉张仲实,万一盛世才真的把你抓起来,就说你是共产党员,只不过不是经延安派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你弄出来,送你去延安。至于沈先生,估计现在盛世才考虑到国内外的影

响,一时还不会动手,万一有情况,再商量想办法。孟一鸣还说,这些意见,是中共在新疆的毛泽民、陈潭秋和他商量过的。

四

正当张仲实身处危险却难于脱身之时,突然收到其伯母去世的噩耗电报。悲痛莫名的张仲实赶快和孟一鸣商量,决定利用盛世才常以孝道教人的特点,请假回老家去安葬从小亲如母亲的伯母,以尽孝道。果然,盛世才马上同意了,说有了便机就可以走。然而,等了一星期,说没有飞机;等了一个月,仍是没有飞机。当时他们天天看着飞机在迪化上空飞过,怎会没有便机?这让本来充满期待的张仲实又掉入揪心和焦虑之中。

4月20日,茅盾突然收到二叔沈仲襄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云“大嫂已于17日在乌镇病故,丧事已毕。”得知至亲至爱的母亲去世,茅盾捶胸顿足痛哭不已。忽然,茅盾想起,何不向盛世才请假回老家乌镇奔丧?于是立刻拿起电话,向盛世才报告母亲在乌镇老家去世,丧事虽已办理但还有些后事需回乌镇料理。同时自己想在迪化遥祭母亲,一会儿写个讣告,送督办过目等等。盛世才同意了。于是茅盾一方面开始准备祭奠母亲,另一方面悄悄地做离开新疆的准备,但给外界的印象是去料理一下就回来。这样,茅盾和张仲实一样,开始等待离开新疆的飞机。

盛世才虽同意茅盾回内地,但一直推托没有飞机,迟迟不放茅盾和张仲实。

焦虑异常的茅盾和张仲实再找孟一鸣商量。孟一鸣告诉茅盾,此次祭奠母亲的声势搞得不错,有利于你们离开。但盛世才知道你们回去后,不会再回来。至于有无飞机,孟一鸣建议私下找苏联总领事。后来,在苏联总领事的策划下,十多天后,茅盾和张仲实终于可离开新疆迪化这

个度日如年的地方了!

就在茅盾5月5日离开新疆的前夜,盛世才给茅盾打电话,以关心的口吻问茅盾,儿子是不是可以不回内地?这明显是想扣留茅盾儿子做人质!吓出一身冷汗的茅盾连忙说,儿子身体不好,这次回去正好给他治病。盛世才听后想了想说:“好吧,明天我来送沈先生张先生。”

第二天上午,盛世才来了,同样荷枪实弹,两辆卡车上架着机关枪,护卫着盛世才的小汽车,派头和迎接茅盾他们到迪化时一样。不过此时的新疆早已不是来时的新疆。茅盾、张仲实心照不宣,和督办盛世才握手寒暄中告别迪化。

茅盾在回忆录中记录当时的心情:九时,飞机离开跑道冲向了蓝天,我望着舷窗外起伏的天山山峦,一阵难以描述的轻松感充溢了全身!是啊,应该让我绷紧的神经松弛松弛了,我们总算逃出了迪化!

途中,飞机在哈密过夜。据说当天晚上,盛世才打了三个电话给哈密当局刘西屏,第一个电话是让刘在哈密扣留茅盾和张仲实。过了半个小时,盛又打第二个电话,说先不要动手,让他再考虑考虑。到后半夜三点,盛世才又来第三个电话,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幸好刘西屏是中共人士,怕盛世才再反复,所以一早就把茅盾一家和张仲实送到哈密机场,以免夜长梦多。

茅盾和张仲实在1939年3月11日到新疆,1940年5月5日逃离盛世才的魔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张仲实没有忘记新疆那段度日如年的岁月,也没有忘记惨死于新疆盛世才手下的老友杜重远先生。当茅盾接到杜重远夫人侯御之的求助信后,曾和张仲实、沈钧儒、胡愈之两次相聚,商量如何建立“杜重远基金会”,救济杜重远遗孀侯御之一家的生活。

(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